



511

人类幸福论

[英] 约翰·格雷著

张草叙譯

商 务 印 书 馆



人 类 幸 福 論

〔英〕約翰·格雷著

張 草 紹 譯

商 务 印 书 館

1963年·北京

Джон Грей
ЛЕКЦИИ 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СЧАСТЬЕ
(选译自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 1955 年版《格雷选集》)

人 类 幸 福 論

[英]約翰·格雷著 張草綱譯

商 务 印 书 館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崇文胡同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 10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3017·87

1963年9月初版 开本 850×11681/88

1963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数 52千字

印张 2 1/16 印数 1—2,500 册

定价(9) 0.40 元

33180

中譯本序

十八世紀下半期开始的英國产业革命，到了十九世紀最初二十五年已經全部完成。机器生产逐渐排斥了手工劳动而在國內取得了統治地位。在这期間，英國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資本主义的工业企业大批出现。与此同时，英國的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成长和壮大。

但是，英國的产业革命給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极端的貧困和深重的苦难。机器生产使广大的小生产者陷于破产，使农民群众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他們之中除了一部分进入工厂直接受資本家剥削外，其余的变成了失业的常备軍，經常掙扎在饥饿线上。同时，新的工业装备又使得資本家有可能雇佣大批的女工和童工，并对他们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工人工作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他們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弄得精疲力尽，而所得到的报酬却很微薄，仅够維持最低的生活。他們的居住条件同样也很恶劣，經常是一家数口挤在一个十来平方米大小的房間里。由于过度的劳动，女工的早衰和童工夭折的现象十分严重。至于失业工人的境况更是非常悲惨。

失业、貧困、政治上的迫害，以及长期对法戰爭所造成的严重的經濟后果，都促使英國无产阶级对統治阶级由內心的不滿而逐渐发展为自发的斗争。不过，工人們在最初的时候还没有认识到

FZ37 / 18

自己的不幸的真正根源，而把一切都归咎于机器。因此，有一个时期，特别是在 1811 年至 1812 年間，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达到了很大的規模，直到 1819 年的工人运动之后，英国的无产阶级在现实的教育之下才逐渐意識到自己的不幸不在于机器，而在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

以上就是英國空想社会主义者約翰·格雷(John Gray)思想观点形成的历史背景。

約翰·格雷 1798 年生在苏格兰，卒于 1850 年。幼年家貧，十四岁时就因生活所迫离开学校，到伦敦的一些大工厂和大商号中工作，开始独立謀生。由于工作关系，他到过英国的許多地方，結識了不少各行各业的人士，有机会亲眼看到資本主义制度的“严重缺陷”和广大人民生活的貧困。后来，格雷对他所接触到的实际材料进行独立思考，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点。他曾这样說：“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无论全部或局部，都非剽窃自任何人的。”虽然，格雷在他活动的初期，曾經贊同并宣传欧文的一些观点，可是在某一些重大問題上，他始終同欧文有着严重的分歧。

1825 年，欧文的忠实弟子亚伯拉罕·寇耳布在格拉斯哥附近創办合作公社，格雷起初很想加入，后来由于在所有制的問題上同公社领导人发生意見分歧，結果沒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就在同一年中，他却写了一本“专门为了捍卫欧文計劃”的著作。这本书就是《人类幸福論》。

《人类幸福論》是英國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卓越的文献之一。由于它具有浓厚的革命气息，同时又写得深入浅出，文笔动人，因而成了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英國工人們最喜爱的

一本讀物。

格雷在《人类幸福論》中首先表述了自己对幸福的看法。他认为人的需要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生命的生物所固有的需要；一种是作为有理智的生物所特有的需要。”前者表现为人需要衣服、食物和住房；后者表现为人都具有求知欲。他說，在这两种自然的需要沒有获得滿足以前，人是不能得到幸福的。接着，格雷列举了大量的事實來說明，人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不是在物质需要上得不到滿足，便是在精神需要上得不到滿足。因此，他认为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不管是富人或穷人都是不幸的。

正如英國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湯普生和勃雷一样，格雷在批判資本主义制度时也是以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學說作为武器的。格雷特別強調“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东西，能使生活愉快和舒适的一切东西，都是人类的劳动創造出来的”（本书第 12 頁）。他把社会上每一个不参加生产劳动的成員都叫做非生产者。这些人中除了向社会提供有益的服务的医生、艺术家和教师外，絕大多数都是无益的成員，他們都是靠生产阶级而生活的，是向这一阶级所征收的一种“直接稅”。可是，在資本主义社会中，越是把自己的劳动貢獻給有益目的的人，越是受人鄙視，而越是能够靠自己的财产来支配別人劳动的人，却越是受人尊敬。格雷认为这种现象是十分不合理的。他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中，必須把这种情况整个倒轉过来。

在旧社会中，劳动人民虽然創造了一切物质財富，养活了整个非生产阶级，而自己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据格雷看来，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們不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在

这里，格雷引証了英國統計学家科胡恩的著作，指出英國生产阶级在1812年生产了总数約为四亿二千六百二十三万零三百七十二英鎊的財富。生产阶级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妇女和每一个儿童平均可以分到五十四英鎊。然而，他們实际上只从其中取得十一英鎊，也就是說，只取得他們本身的劳动产品的五分之一稍多一些，其余的部分都被非生产者用地租和利息的形式所夺走。

接着，格雷尖銳地批判了地租和利息的剝削性。他說，既然劳动是財富的唯一基础，那末地主不参加任何田間的劳动，到时候却把別人的劳动据为已有，“这就是极大的不公平”。同样的，他也譴責食利的不义性。他认为，食利是一种“用虽然合法但不公平的手段叫別人供养自己吃閑飯的方法”（见本书第38頁）。因此，他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让劳动人民有可能得到自己所創造的全部的劳动財富，并用自己不需要的一部分劳动产品去交換他們所需要的东西。格雷断言，如果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每年再得到近四十英鎊的收入，那末，他們就能够綽綽有余地购买生活上的一切必需品，自然，他們的生活也就会过得十分愉快。

格雷的《人类幸福論》的最有价值的一面，在于它論証了价值是工人的劳动所創造的，揭露了工人所創造的价值绝大部分都为不参加生产的資本家和地主据为已有，指出这是同以公平交換为前提的价值规律的要求背道而馳的，从而要求把劳动者所創造的財富全部归还給他們。正如恩格斯对整个英國空想社会主义所說的那样，格雷也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里嘉图的价值学說和剩余价值学說，以攻击資本主义生产”^① 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編者序第17頁。

但是，我們在《人类幸福論》中也发现了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格雷的一般历史局限性和他的阶级局限性。

我們知道，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来都不认为自己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是以全社会各个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自居的。他們宣称，不但要改善“最受苦的”工人阶级的生活，而且还要改善社会上养尊处优的那些成员的生活。这一点在格雷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不过。格雷一方面固然深切同情被剥夺去将近五分之四的劳动产品的生产者生活的贫困，另一方面却又怜悯剥夺他人劳动产品的非生产者的处境的困难，认为在充满了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人阶级得到的财产数量，是他们的服务可能得到的最小数量”，“债主和房东得到的财富，是他们靠放债和出租房屋可能得到的最小数量”（见本书第 64 頁）。在格雷看来，连这些人都不能算是幸福的。因此，格雷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中不但要取消剥削，让劳动人民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而且还应该废除竞争，以便让商人、债主和房东得到最大数量的收入。格雷同时要改善两个利益完全对立的阶级的状况的想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不理解无产阶级的世界性的历史使命，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政治斗争采取否定的态度，是整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特点。这种倾向在格雷的身上也表现得很突出。格雷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剥削人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却把制度同人严格地划分开来，认为剥削的过错在于制度，而不应归罪于任何一个个别的个人，甚至任何一个阶级。因此，在他看来，“对于一个由于他无力判断的情况而偶然处于压迫者地位的人，哪怕怀有一点点的敌意都是非常不公平的”（见本书第 31—32 頁）。

从这一种观点出发，格雷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他說：“我們最不贊成采取暴力手段来消除貧困；我們相信，暴力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达到长期的改善”（本书第37—38頁）。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社会制度》中，格雷竟要求人民停止进行任何政治爭論，甚至应放弃向議会递請願书的权利。在格雷看来，只要向人民指出真理，說明目前制度的錯誤，并且提出一个較好的制度，似乎不需要經過任何政治斗争就可以从資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由此不难理解，列宁为什么把整个空想社会主义叫做“非政治的社会主义”^①。

除了上面所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外，在格雷身上还存在着由于强烈的小資产阶级傾向所产生的阶级局限性。这一点也是格雷同欧文发生主要分歧的所在。欧文把私有制看作人类一切灾难的根源，因而坚决主张加以废除，即便是小私有制也不例外；而格雷却主张保存小私有制，也就是說要保存小商品生产的条件。他說：“这里所談到的計劃，和欧文先生的計劃截然不同，但是我希望它将是有益的，它会向全世界證明，利益的一致跟个性和跟財产的差別完全是并行不悖的”（见本书第71頁）。这几句话充分反映了格雷的上述见解。

圣西門、傅立叶和欧文这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把按照社会主义协作的方式来組織生产看作一項首要任务。他們力图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来消除社会的貧困，从而达到改善社会全体成員的生活的目的，而格雷却从深受市場价格波动之苦的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把組織流通摆在首要的地位。他认为，“只有彻底

①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議書》。《列寧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2頁。

改革商业制度才有可能使人們得到重大的福利”(见本书第 67 頁)。正是这一种观点促使格雷后来在《社会制度》一书中提出“劳动貨币”的学說，企图在不触动所有制的基础上用“劳动貨币”来克服商品銷售的困难，消除所謂貨币对于商品的权力。

不过，格雷上述的錯誤见解，在《人类幸福論》中还不曾形成有系統的理論。在这本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对于資本主义制度的批評和对人剝削人的現象的揭露。正是基于这一个理由，格雷的《人类幸福論》一直被看作是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一本优秀著作。

郭一民

1963 年 7 月

目 次

原序	2
引論	3
对社会的一般概述	12
工作对个人幸福的影响	33
引文	47
竞争是生产的界限	59

原序

下面这篇文章是論文集的第一篇，这些論文將每隔兩個月左右發表一篇。這裡討論的一些問題，可能是依據跟整個教育制度向目前這一代人灌輸的觀念很不一致的觀點來加以探討的。因此，在那些尚未形成與自己青年時代的最初印象相反的任何觀點的人看來，也許會覺得我們的見解是錯誤的。不過我們要問一下，上述見解果真是錯誤的嗎？我們和傳統觀點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以下的方面：在舊社會，人們受人尊敬的程度，是按照他們依靠自己擁有的財產能支配別人的勞動的程度而定的。懶惰和不做事，無疑是受尊敬所必需的東西；人們受人卑視的程度，是按照他們為有益的目的所貢獻勞動的程度而定的。在新社會中，情形恰巧相反，我們願向所有的人保證重視他們對社會的服務，我們願按照人們為人類幸福帶來的利益而給予他們尊敬，我們重視的並不是金錢，而是能改善人類體力、道德和智力狀況的每樣東西。

引　　論

有一种我們賴以出生在世界上的力量，使人产生了要和別人联合起来的願望，假如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實的話，那末这就表明，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因此，如果社会上发生极端有害的混乱現象，如果有人得到一种可使其他各种人遭受残酷压迫的权力，那末这就表明，要末就是上帝創造人是要他們受苦，要末就是人們還沒有认识到使人类社会变成幸福社会所应依据的那些原則。

假如人們从来就不过社会生活，那末他們的状况与其他生物就未必会有什么不同。他們从事一切工作就只是为了滿足自己基本的自然需要。由于每一个人只能拥有他靠自己的劳动习惯所得到的东西，因此，他所得到的东西是很少很少的，甚至連生活必需品方面也是如此。人們的积蓄本身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改善自己的状况。然而，人类所独有的互相交換劳动的意向，是使他們能够不可比拟地超过一切无知生物的首要原因。

既然只是由于交換的緣故，才产生了一种使个别的人能够強制地統治人民的力量，那末为什么我們經常把我們的痛苦归咎于政府的錯誤呢？請希望別人得到幸福的人們在这里想一想，好好地考慮一下吧！請他們牢牢記住这样一个事實：交換而且只有交換才是社会的基础，人們之間其他的一切关系全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請他們首先記住这个事实的全部重要意义。如果他們能

够摆脱偏见，把自己原先对人类貧困的原因所持的結論丢开一刹那，如果他們願意耐心地、仔細地分析目前的商业制度，那末他們就能在这个制度中找到造成人类本性某些可怕缺陷的原因。

慈善家經常企图用抓后果的方法来改善自己亲邻的状况，这是徒然的。要使社会得到长期的好处，需要注意原因。然而我們的各种計劃主要只是用不彻底的措施来消除貧困。我們企图依靠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的帮助来克服社会上的困苦，而这些慈善机构虽然表明了它們的善良的願望，但同样也表明了它們的无知；然而这种企图是徒然的。但願能够建立起消除产生人类貧困的原因的社会：这种社会并不給予貧乏的人以帮助，而是消除了貧乏的原因；这种社会并不用金錢来帮助穷人，而是消除了穷苦的原因；这种社会并不去捕捉小偷，而是消除了对偷盜的一切誘惑；这种社会的主要的目的是在所有的人中間平分幸福的好处，和睦地、和平地、一心一德地把人們联合起来。只要能出現建立在这个原則上的社会，它就不再需要任何的帮助；它的成就将是这样的：經過不多几年以后，一切慈善机构，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不管它們的目的是什么，都将永远关闭。

大自然的創造者——不管我們叫他什么——把自己的特性賦予了他所創造的一切东西。只有了解这些特性，重視这些特性，我們才能够使这些东西达到完善的程度，或者使它們接近完善的程度。他使植物具有自己的特性，因此在照料植物的时候，我們就要注意每一种植物的特点，就要在我們的知識和技艺可能的范围内，保証每一种植物能得到它所需要的土壤、特殊的地勢和溫度。因為我們知道，試圖叫它按照我們的意見去适应另外一种土壤、地勢或

溫度，將會白費力氣。創造者使人類也具有自己的特性、自己的自然權利和使用這些權利的意向，因此如果我們想使人類達到按其天性所能達到的完善程度，或者至少接近這種完善的程度，那末我們就應當使人類的一切規章制度能適應他們的天性。因為經驗經常能够充分證明，我們不可能任性地用規章制度去束縛人類的天性而不破壞他們的幸福。使人類的天性服從於跟它相矛盾的法律、規章和習慣的企圖；縱然不是使人類遭受災難的唯一的根源，但也是主要的根源。在這方面沒有進行徹底改革以前，促使人類幸福的任何嘗試都不會有什么結果。

我們知道得非常清楚，社會上一部分無知的人把那些贊成歐文的計劃的人稱做熱心家；而歐文本人在這些人看來如果不是瘋子，便是空想家。我們試著來說明人們對他產生這種看法的原因，並且對概然性的問題稍微說幾句話。

未必會有兩種東西相互之間的區別比實際概然性和可能的概然性之間的區別更大：前者取決於某件事物的實際可實現性，後者取決於對事物的基礎的認識。

只有不可能用一定的原因加以解釋的事物才是完全不可置信的。譬如，如果有人說，聖保羅教堂明年會自己搬到另一個地方去，這是完全不可置信的，因為誰也不能想像它有進行這樣事情的力量，而沒有這種力量，自動遷移地方是不可能的。

隨著認識事物的困難逐漸減少，事物的可能性便變得越來越大き了。

譬如，如果有人對我們說，他發明了一種東西，利用這種東西他能夠在空中行動就像在水中行動那樣的方便，那末對這種說法

我們就不会持有像對待上面的例子那样的态度了，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了能够促使在这方面迈出第一步的那种力量。但是由於我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逆风行进，因此我們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相信这种說法，除非讓我們看到一种我們能賴以在空中朝着我們所希望的任何方向行进的新发明的力量。

如果有一件事情，促使它产生的某种力量是容易解釋清楚的話，那末这件事情就完全具有可能性。例如，我們能毫不怀疑地提出下面的說法，因為我們能證明它的正确性：“每一个英國人都有可能得到一切生活舒适品。”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知道有一种力量，它使我們有可能創造出足够的生活舒适品，甚至比滿足社會上每一个成員所希望得到的数量多两倍的生活舒适品。我們知道，所有的人都願意得到这些生活舒适品，只要他們能够得到的話。我們知道至今阻碍着广大群众得到这些生活舒适品的原因，并且將在这几篇論文中加以充分的說明；我們還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消除这个原因。我們有着取得財富的意願；我們有着創造財富的力量，我們知道各种計劃，使財富的分配能导向預期的結果。

然而这种說法必然会受到怀疑；如果不是这样，那才值得奇怪呢！因為我們可以毫不夸大地說，一百个人里面有九十九个人的見解是与刚才所說的概然性的要求或其他明智的原理不一致，只同先例相符。可是哪儿有物质福利和財富均等的先例呢？

當我們听到一件新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时，我們最初的感觉是惊奇；这种惊奇的力量，經常正好跟我們听到的事情与以前已經存在的、以前听到的或預期的事情之間差別的大小成正比。但是當我們的惊奇心稍稍淡漠下去以后，那末第一个問題将是：

“这是怎样发生的呢？”或者——如果这仅是例外的話——是：“这怎么能发生呢？”如果我們后来明白，它的原因是与結果相符合的，我們就相信这件事，否則就不相信。因此，如果上面所說的是正确的（我們不怕任何反駁），那末很明显，要認識过去沒有先例的結果，首先必須了解产生这种結果的力量，然后才能使我們覺得它是可能的。因此，假如歐文的計劃現在为大家所歡迎，那才真正值得奇怪，因为要在实际上得到一致的同意，它首先要被大家所理解。现在一千个人里面沒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在其中生长和受教育的现有的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一万个人里面會有一个人理解歐文主张的制度嗎？然而尽管这样，有无数人对問題甚至沒有作过一分钟的考慮，却指摘它是空想的、荒謬的。这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人們一般都是受先例支配的；沒有先例，直接就表明它是不可置信的。在我們从来没有听到过汽球的事情，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汽球的事情之前，如果有人說，它比空气更輕，能上升到比天上的云更高的地方，大家就会把他当作疯子。即使有某种論点能够完全証实他的意見，也只会有少数人願意接受。

如果真是这样，那末人們在听到新的結果可能由新的情況所引起之后，要是他們並不通过揭示新說法与实际现实之間的區別的途径來作出自己的判断，而是問：“这件事是由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成的？”然后只是在研究的基础上决定原因与結果是否相适应，这样，他們的行为就会明智得多。这是对待事物的唯一明智的方法。然而广大群众从来并不努力去掌握这种方法。这就是社會輿論对新事物的看法經常不正确的原因，而且仅是由于这个原因，歐文才会被人称做空想家，这些人不是过于懶惰，不想去分析他的